

# 人与神

——二十世纪人们眼中的秦始皇

徐了然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doosive-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人与神  
——20世纪人们  
眼中的秦始皇

徐了然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京):新登字096号

书 名	人与神——20世纪人们眼中的秦始皇
编 者	徐了然
出 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发 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政编码:100866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1995年8月 第一版
印 次	1995年8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8-1065-8/K·30
定 价	14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引言

# 历史审判官<sup>(1)</sup> ——观秦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sup>(2)</sup>的门外,车流如簇,游人如潮。广场上嚣尘飞舞,欢声洋溢,一片热烈祥和的景象。来自五大洲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兴致勃勃地欲一睹这世界八大奇迹<sup>(3)</sup>之一的秦陵兵马俑。

进入博物馆的展览大厅,人们突然为厅内的凝重气氛慑住了。围伫在俑坑四周的观众,面对着气势恢宏、雄伟的秦俑军阵,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惊奇的赞叹!一声声、一阵阵,此起彼伏,汇成了连绵不断的深沉乐章。这乐章,从人们绷紧的每一根神经的琴弦上弹奏出来!

人们叹赏的不仅是秦俑军阵宏伟壮观的场景,和那丰富隽永的艺术魅力,而是从众多秦俑的外形和内涵中所反映的远古历史。它向人们揭示出:两千多年前,秦人争取统一的信念、力量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显露出:秦王朝在暴政统治下,灾难深重的社会状况和酷烈悲凉的时代氛围。它使你感受到当年秦人的战斗、生活及内心的隐衷。

那身着戎装的将军俑、武官俑、骑士俑和弩兵俑,有的刚

劲、沉雄；有的浑朴、粗犷，体现了八百里秦川壮士的豪迈气概！正是这些当年在战场上策马驰骋、气冲霄汉的一代英雄，曾使六国将卒魂丧胆裂，望风披靡！

然而，与此不同的那些老年、中年和年轻的兵俑，或髭须直立，或双眉倒竖，或面容憔悴，或目光呆滞。它们的神情和心境，显得那样忧伤、凄楚、阴郁和怨愤！是对死者的哀念，还是对生者的怜悯？是怨苍天的冷酷，还是愍人世的悲怆？是对旧君的怀恨，还是对新朝的抗争？回答是沉默，久久地沉默。人们从那大群兵俑中，竟找不到一张笑逐颜开的面容。

你若再细心体察一下，就会发现，兵俑们有的蹙额锁眉，仿佛迷惘若失，满腹疑团：五百多年的战乱(4)平息了，为什么人心不得安宁？七雄割据(5)的局面消除了，为什么社会仍在动荡？人世间出现了天之骄子——秦始皇帝，为什么给黔首带来更深的灾难？怀着这种种疑团的兵俑们，在被封埋的地下深处，苦苦沉思了两千多年，而今有幸回到了地面，但那些疑团却似乎仍在折磨着它们，它们期待着今人作出满意的答案。

这大群兵俑是秦始皇派到冥间的。他要使地下冥国和地上王朝一样，有一支浩荡雄壮的“御林大军”，拱卫着他，为他扬威；他要以此体现秦人的尚武精神和永保嬴氏江山的坚强信念。可是，他不曾料到，这产生于皮鞭之下的一个个兵俑，却成了受他暴政之害的控诉者：当年，来自中原各地的艺匠们，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把满腔的悲痛和仇恨，绝望和迷茫，把世人心灵深处的一切，尽情地倾注、凝聚、物化在这形态各异的兵俑身上，从而谱写出“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6)！

历史是最权威的法官。

人心是最准确的天平。

秦俑，是一首悲壮的史诗。它既讴歌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宏伟业绩；也折射了秦王朝短祚的深刻教训。

秦俑，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把嬴政的真实形象及其是非功过，映现在世人面前。

秦俑，是一群公允无情的历史审判官！

### 注释：

(1)马克思曾说：“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页）尽管人们对秦始皇帝已作出种种评价，历史还将会对他作出新的评鹭。

(2)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建在兵马俑坑之上，位于陕西省临潼县东五公里处的秦始皇陵附近。

(3)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参观秦陵兵马俑时称：“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详见《秦陵地宫之谜》，载《瞭望》杂志1985年第42期）

关于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说法不一。通常是指：①埃及的金字塔；②巴比伦的空中花园；③以弗所的阿苔密斯神殿；④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⑤哈利卡纳苏（小亚细亚）的摩索拉斯陵墓；⑥地中海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巨像；⑦亚历山大城（法罗斯岛上）的灯塔（见《辞海》1979年版第38页）。此外，也有的将我国万里长城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上述七大奇迹，大多已成废墟。

(4)从公元前七七〇年至前二二二年，是我国古代春秋、战国的战乱之世。

(5)战国时代，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大诸侯国，曾分裂割据长达二百六十年之久。

(6)从某种意义上说,秦俑作者和法兰西伟大文豪巴尔扎克一样,他们“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所不同的,一是法国封建贵族的波旁王朝;一是暴政统治的秦帝国。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品,它必然“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 目 录

引 言	历史审判官——观秦俑·····	(1)
-----	-----------------	-----

## 上 篇 人—秦王政

第一章	乱世烟云·····	(2)
第二章	高原雄风·····	(11)
第三章	奇特的身世·····	(22)
第四章	崭露峥嵘·····	(36)
第五章	时代的冲突·····	(45)
第六章	理性之歌·····	(57)
第七章	“……死不恨矣”·····	(65)
第八章	叱咤风云扫六合·····	(79)
(一)	统一前夕·····	(79)
(二)	中间突破·····	(81)
(三)	进攻三部曲·····	(83)
(四)	袖绝志不移·····	(84)
(五)	因势取胜·····	(89)
(六)	纾尊救过·····	(90)
(七)	不攻自破·····	(95)
第九章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100)

## 下 篇 神—秦始皇

第十章	帝神降世·····	(116)
-----	-----------	-------

第十一章	建“万世”帝业·····	(129)
第十二章	立一统之制·····	(140)
第十三章	“水德”与秦法·····	(150)
第十四章	南征北讨·····	(161)
第十五章	自我神化的喜剧·····	(172)
第十六章	刻石涂金·····	(188)
第十七章	“以暴虐为天下始”·····	(196)
	(一) “头会箕赋,输于少府”·····	(196)
	(二) “田租····二十倍于古”·····	(198)
	(三) “丁男被甲,丁女转输”·····	(199)
	(四) “蜀山兀,阿房出”·····	(202)
	(五)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205)
	(六) “穿治骊山”·····	(210)
	(七) “赭衣塞路,圜墙成市”·····	(215)
第十八章	千古之罪·····	(225)
第十九章	沙丘悲剧·····	(240)

## 末 篇 人 与 神

第二十章	古人的评说·····	(251)
第二十一章	今人之争议·····	(263)
第二十二章	从人到神的功与过·····	(277)
附录一	秦始皇帝大事年表·····	(292)
附录二	历代对秦始皇的评论辑要·····	(301)
后 记	·····	(335)

上篇

人——秦王政

# 第一章 乱世烟云

战争，这个人世间的怪物，毁灭了地球上无数生灵和财富。然而，也正是它，“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sup>(1)</sup>。战争的这种两重性，在我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体现得非常显著，非常生动！

公元前四八一年至前二二二年<sup>(2)</sup>，是我国继春秋之后出现的战国时代，是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社会经济、政治大变动的年代，也是从诸侯割据趋向统一的历史演进时期。它与古希腊奴隶社会的马其顿亚历山大称霸，大体处于同一历史时期。

春秋末，原属周王朝分封的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小国，经过“强侵弱，众暴寡”（《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各章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引自该篇）的兼并战争<sup>(3)</sup>，至战国初，逐渐实现了局部地区的统一，形成了秦、齐、楚、魏、韩、赵、燕七个主要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七雄割据，争战更烈。为了夺城略地，争霸称雄，彼此相互攻伐，混战不息。今日“合众弱以攻一强”（合纵）；明天“事一强以攻众弱”（连横）（《韩非子·五蠹》）。列国间忽而罢兵和好，忽而背盟相杀。那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孟子·离娄》）的战乱危难之年；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的波诡云谲之世。

战国七雄的总人口约二千万，兵员总额竟超过五百万，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交战规模由几万增至十几万到几十万。战争持续时间，由数天延至数月，甚至连年攻战。战争方式由单一的车阵冲击战，发展成多兵种的车、骑、步混合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二百六十年间，大小战争多达三百余次<sup>(4)</sup>。“七雄交哄，所损士卒当二百万有奇矣”<sup>(5)</sup>。所以说，战国历史，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争战史，是军人和策士用肉体与智慧写成的。史称这一时期为“战

国”，名副其实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6)。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选集》第3卷第71页)。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扩张领土、称霸中原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政治斗争无不产生于经济的运动和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战争，既是经济运动的产物，又是争夺经济利益的手段。

春秋中叶，铁器开始运用，继而出现了牛耕。至战国中期，已经普遍使用铁农具和耕牛(7)。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农业生产发展到新的水平。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也相应有了发展，金属货币应运而生。经济贸易出现了“负担担荷，服牛驾马，以周四方”(《史记·货殖列传》)的活跃景象。城市商品交换的发展，使不同地区在经济上互相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的飞跃发展，为政治上要求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客观需要；同时，也促使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争夺社会财富而相互厮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处于两种经济形态交替的历史关头，各种矛盾异常激烈复杂。由于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存在利害冲突，国与国之间便产生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愈演愈烈。随着争战双方自身条件的变更，对立逐渐转化成统一，从而加速了强吞弱、大并小的进程。如果说，春秋时期的争夺打乱了名存实亡的周王朝的一统天下；那末，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则孕育着新的封建社会的更高统一。所以，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说，分裂割据引起的兼并战争，客观上将成为走向全国统一的推进器。

“春秋无义战”，战国亦然。“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争战各方无非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以求在战争中获取霸主的地位，进而实现一统天下的最高欲望。谁要达此目的，谁必须具有国富兵强的实力，这是保证兼并战争获胜的

决定条件。

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一方诸侯之长），力攻争强，胜者为右”（《战国策·序》）的情势下，各国封建统治集团，一方面要制服国内奴隶主贵族的顽强反抗；另一方面要在战场上打败敌国保存自己。面对这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战乱“急世”（《韩非子·五蠹》），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为了富国强兵，他们分别采取了一条共同的治国方略，即战国中期相继掀起的变法革新热潮。所谓变法，就是用地主阶级的“法”，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以“法治”取代“礼治”；革新，就是通过废除“古礼”，改变不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各国变法的著名代表有：魏文侯时的李悝，齐威王时的邹忌，楚悼王时的吴起，韩昭侯时的申不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秦孝公时的商鞅。由于各国封建统治势力强弱不等，领导变法的决心和措施有别，对变法人材的重视和使用不同，致使实施变法的广度和深度差别很大，变法的成效也大不一样。

通过变法，政治上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种种特权，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理》）的原则，对封建国家有功之人才能享受禄位。这就确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开辟了道路。经济上推行“尽地力之教”（力求种好地）和“重农抑商”（《汉书·食货志》）的政策，确立了小农个体经济，为建立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军事上改革旧军制，实行征兵制，建立常备军；以铁兵器代替青铜兵器，发展坚甲利兵，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组织上采取“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史记·赵世家》）的政治措施，起用众多能为地主阶级效忠的文臣武将，保证了国家政权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

这“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叙论四》），其声势之浩大，内容之丰富，历时之久长，影响之深远，为中外历史所少有，构成了战国时代另一特征。变法的结果，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废除奴隶社会制度，确立了封建社会制度，增强了国力，推动了社会进步，宣

告了我国地主阶级彻底战胜了奴隶主阶级。所以说，战国时期的变法革新，“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化运动”<sup>(8)</sup>，是兴国强兵的必由之路。历史证明：变则强，不变则弱；变则存，不变则亡。

一定的经济基础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带来意识形态的更新和解放。经济形态的更替，引起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处于社会动荡中的“文士”阶层，具有一股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蓬勃朝气。他们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门禁，纷纷走向社会。“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们或游说时主，或拜师授业，或著书立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篇》）。他们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积极参与政治，为结束战乱争相提出各自的治国主张和新说异论，构成了当时最活跃的一个社会阶层。

与此同时，身处历史激流中的各国统治集团，从斗争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战争不仅是军力和财力的较量，更是智力的相斗。为此，他们急需有奇才异智的谋臣策士，为其治国强军出谋划策。“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容斋随笔》第2卷）。于是在各国统治集团中，出现了罗致人才、礼贤下士的宽容气度；又由于各国内部及国与国之间，长期存在争权和割据纷争的动荡局面，形成诸侯异政所特有的思想统治的内外空隙，给不同主张的自由争辩以生存发展之机。有了这种客观需要和政治环境，以学识为业的智士说客们，“皆出于救时之弊”（《淮南子·要略》），跃身登上了政治舞台，为追求各自的抱负而施展个人的才智。他们相互辩驳，纵智论争，形成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文化盛世。诸子百家的大量著作相继涌现，谱写了我国历史画卷中五光十色、璀璨夺目的一页！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战国时代彪炳史册的又一显著特征。

战争的风云和变革的雨露，滋育出万紫千红的“百家争鸣”之

花，使这一英雄时代大放异彩！

在那剑与笔交相挥舞的年代里，战场上千军万马在拼杀格斗，学宫里诸子百家在挥斥方遒。那班“羸膝履蹠、负书担橐”<sup>(9)</sup>，跋涉在荒山郊野上的策士说客们，餐风沐雨，冒着诸侯争霸的刀光剑影和滚滚狼烟，奔波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列国间纵横捭阖，驰说诸侯。“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战国策·书录》）。他们有的确能左右局势，决定成败，被誉为“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论衡·效力》），甚至被夸赞成“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致使诸侯王公们不得不移樽就教。他们深受国君的器重，有的被委以卿相，有的被礼之为贵宾，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战国时的诸子，有从贵族下降而来，有从庶民上升而出。“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页）。由于他们的出身和社会经历不同，所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异，随着社会矛盾的演变和客观需求，先后形成了儒、墨、道、名、法、兵、农、杂，以及阴阳、纵横、小说等诸家学派<sup>(10)</sup>。真是五彩缤纷，群星争辉！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尚无统一的权威。在“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汉书·艺文志》）的复杂多变的状态下，他们的学说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受到的社会待遇各不相同。春秋末至战国初，是儒、墨显学对立之时。其时奴隶主贵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提倡“兼爱”、“非攻”、“贵廉”的墨学，逐步失去其显学的地位；当各国封建统治者手握刀剑争霸的时候，儒家思孟学派却重弹“王道”、“仁政”、“崇礼”的旧调，理所当然地要四处碰壁。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诸子百家尽管众说纷争，各有所据，最终要受这个客观规律所制约。所



以，注重功利，不道仁义，崇尚暴力，强调耕战，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理论，适应了战国乱世的需要，受到了有识之君的青睞。这样，战国前期的儒、墨、道三家，虽然一度平分秋色，但不久便让位于熠熠生辉的法家学说。一篇篇犀利、刻削的法家论著，相继面世。以管仲、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吴起、韩非等为代表的杰出法家，深受世人注目。他们的思想理论，流传颇广，影响很大。人们普遍认为：今欲并天下，非兵不可。“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战国策·秦策一》）。而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又必须具有高度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号令和步伐，这就需要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身上。因此，崇法尚武，鼓吹尊君集权的法家学说，在战国后期便逐渐成为诸侯治国的精神支柱。尤其在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最彻底，成效最卓著，法家思想在全国深深扎下了根（详见下章）。

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升级，要求结束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也日益强烈。这不仅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连年不熄的遍地战火，使各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给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长年血战，造成人口大减。仅秦一国的杀人数目，竟达一百七十万之多<sup>(11)</sup>。长平一战，秦军坑杀赵俘四十多万。真可谓“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汉书·刑法志》）。战场上“流血成川，沸声若雷”（《战国策·秦策三》）。大军所至，“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沟池”（《墨子·非命下》）。战争使“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更为残酷的是，有时交战一方疯狂地决堤开河，借滔天洪水冲陷敌方城邑，害得城内居民“巢居而处，悬釜而炊”（《战国策·赵策一》）。又因诸侯各霸一方，彼此以邻为壑，或截断水流，或阻塞交通，这不仅对农业生产危害极大，还严重阻碍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现实充分表明：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人民要生存，都有赖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于全国统一的实现。

统一，不仅是被压迫农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广大工商业者和地主阶级的切身要求。对此，诸子百家在言论中共同表达了这一呼声。早在春秋末，儒家创始人孔子在编著《春秋》时，就首倡“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号称亚圣的孟子，也疾呼天下必须“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只有全国统一，社会才能安定。墨子认为要达到“天下治”的目的，“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地主阶级思想集大成者荀子，明确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口号。唯其如此，方能实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治）”（《荀子·王制》）。他还认为“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王霸》）。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同样强调要“一天下”。“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法家著名代表人物韩非，不仅提倡以暴力实现统一，还竭力主张实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

“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诸子学说中的这一共同主张，为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这对于行将到来的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开创，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他们“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3页）。战国后期的历史潮流，把世人对实现统一的理想，逐渐推向了现实的斗争实践之中。

历史表明：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战国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统一与分裂，兼并与反兼并（割据）的斗争。由此而产生的“战乱纷争”、“变法革新”、“百家争鸣”，构成了战国时代的三大特征。这是我国古代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如同三匹骏马，共同拉着历史车轮，沿着新铺设的封建制轨道，向着全国统一的伟大目标

飞驰前进！

分裂导致战争，战争促进变革，变革引起争鸣。三者相辅相成，最终将成为推动统一的历史合力。“分久必合”，“乱极而治”，这是天地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处在这种历史趋势中的战国七雄，哪一个能充当促进历史发展的主角？能担负统一华夏的历史使命？这仍然要由历史来选择，由时代来造就。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风雷激荡的战国英雄时代，造就了许多多名垂史册的杰出人物。嬴政就是这烟云密布的乱世被推举出来的，是这一独特时代造就出的第一个独特的封建皇帝。

### 注释：

(1)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一文中称：“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页）。

(2) 战国时代始于何时？史学界有说是公元前四八一年、前四七五、前四六八、前四五三及前四〇三年等不同看法。笔者同意扬宽先生之见，即始于前四八一年。这一年齐国田氏推翻了奴隶主统治，建立了地主政权。此后，鲁、晋等国的地主阶级也相继取得政权，中原地区先后进入封建社会。故应以此年作为战国之始（详见扬宽著《战国史》）。

(3) 据《春秋》记载：“春秋”时约二百八十多年间，中国境内大、小国一百四十多个。也有的说仅五十余国。还有一百七十、一百三十九、一百二十四、二百零九等国数之说（参见吕思勉著《先秦史》第150页）。另据史书记载：春秋时，齐灭掉三十五个小国及一些部落（《荀子·仲尼》）；楚灭掉四十余国和一些部落（《吕氏春秋·直谏》）；晋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吕氏春秋·贵直》）；秦益国二十，开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

(4) 根据《战国史》一书所附《战国大事年表》中的有关统计所得。

(5) 见梁启超著《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

(6) 战国时的策士苏代有云：“凡天下之战国七……”（《战国策·燕策一》）。西汉刘向编《战国策》时，始以“战国”为这一时代的称谓。

(7) 据 1986 年 6 月 1 日《光明日报》载：陕西雍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春秋中期的雍城大墓出土铁铲多把，说明那时已使用了铁工具。又韩国磐先生确认“牛耕起于”春秋（见《牛耕早在赵过之前》，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 年第 4 期）。战国中期普遍使用铁农具和耕牛的情况，参见《孟子·滕文公上》。

(8) 参见金景芳撰《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载《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9) 引自《战国策·秦策一》。羸，缠绕。膝，绑腿布。跣，草鞋。意即缠着裹腿，穿着草鞋。橐，装衣物的布袋。

(10) 据《汉书·艺文志》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司马谈列主要的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刘歆和班固列十家，谓“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11) 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第 4 卷记载：秦自献公二十一年至始皇十三年，共斩敌首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另据《秦史稿》第 348 页注 2 的统计，秦自孝公八年至昭襄王五十一年，有明文记载的杀人总数，已超过一百三十万人。又据董草撰《秦灭六国斩首兵员知多少？》一文中称：“秦战六国所灭的兵员较接近事实的数目，应为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人。”该文载《吉林日报》1985 年 4 月 10 日版。

## 第二章 高原雄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考古学正处于黄金时代。考古事业,硕果累累,而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对秦陵的勘探和发掘。如今,由秦国西陵、东陵和秦始皇陵组成的秦陵系列已经形成。秦立国后的三十六位大公、君王及皇帝的陵寝、陵园,大多被探测到了,有的已发掘就绪。

令人瞩目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在秦东陵发掘两座大型四面斜坡墓道式“天子”级别墓葬,是迄今所见先秦时代最大的墓葬。墓室顶部面积 3306 平方米,比秦公一号大墓墓室顶部大三分之一。墓深达二十五米以上,超过商王陵十多倍。值得重视的是,墓的方位,和西陵秦公一号大墓一样,都是坐西面东,一反以往殷、周王墓葬坐北朝南的传统格局。墓葬形制,不是如一般代表诸侯国君身分的“中”字形,而是表示天子即帝王身分的“亚”字形<sup>(1)</sup>。这一发现,引起史学界极大的兴趣,也引起人们的深思。

原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很长时期,秦国历代统治者虽然僻踞西土,但人人胸怀东方中原大地,皆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遗憾的是,他们的宏图意愿都未能实现,一代代赍志而殁。然而,君位虽移,东进的遗志未改。死后葬身,既不朝西,也不向南,个个面向东方。既充分表明了中国社会运动的内聚力所起的支配作用,也显示了秦国历代大公和君王怀有“包举”中原的强烈志向,并将这一志向和信念,代代相传,世世不变。

由此可知,秦始皇能够实现统一,绝不仅是“续六世之余烈”<sup>(2)</sup>,而是秦国历代君王的追求,是他们代代奋斗的“余烈”的积成。这种追求和“余烈”,起始于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奠基于战国中期的秦孝公,成熟于战国晚期的昭襄王。秦国发展壮大最为显著

的，是在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这四个历史时期。

公元前六五九年，秦穆公继位后就致力于扩土振邦。他不甘心作西陲小国之君，一心欲向东进取。为追求霸业，他以“霸城宫”命名宫殿；改兹水为“霸水”，“以章霸功”（《汉书·地理志》）。夺得河西大片土地后，他又企图向河东扩展。因受强晋所阻，穆公不得不回师西征。

强悍、善战的“西戎”氏族部落，对秦不断骚扰。为了安定后院，穆公决心征服西戎。他采用了臣下离间戎王同由余（戎王特使）的计策，同时又赠给戎王年轻貌美的“女乐”，“以夺其志”。由余降秦后，“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公元前六二三年（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sup>(3)</sup>，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穆公为秦开创了崭新的局面，秦国疆域向西扩展到今西宁、敦煌一带，实现了西北局部区域的统一。这不仅引起了东方六国的瞩目，连周天子也特赠金鼓相贺。在秦国历史上，谱写了初展雄威的新篇章！

秦国独霸西戎，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秦国经济的发展。此后，广阔、富饶的关中地区，成为秦国东进的可靠根据地。对于穆公任贤治国的业绩，孔子曾誉之曰：“虽王可也”（《史记·孔子世家》）。可见穆公为秦国强盛所起的开拓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与穆公相隔二百多年的秦献公，是一个较有作为的君主。他初步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废除了野蛮的人殉制<sup>(4)</sup>；实施以五家为“伍”的编制，以便于征兵和收税；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允许商人在城内设市；在建立县制的同时，将国都从雍（陕西凤翔）东迁栎阳（陕西临潼县北），显示了要继续东扩的志向。献公的初步改革，对秦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其后实行大规模的变法革新拉开了序幕。

秦国的真正崛起，是始于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革新的实施，是秦国历史上一次重大转折和飞跃。

公元前三六一年，继献公而立的孝公，年方二十一岁，朝气蓬勃，富于进取。他不甘心东方强国以“戎、狄”相待，连会盟也不邀秦，并以此为耻，坐卧不安。为了继承父公未竟之志，恢复先祖穆公的霸业，遂下令国中：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霸），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这是一篇传诵后世的求贤令，是奋发图强东进雪耻的决心书。其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先君河西地”，进而满足其扩土称霸的强烈欲望，并非是“企图恢复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sup>(5)</sup>。看他是如何见用商鞅的，便可知其用心所在。

这篇求贤令深深打动了不受魏王重用的卫鞅<sup>(6)</sup>，他带着李悝的《法经》，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秦国，经三次求见，才被孝公看中。前两次他向孝公谈论“帝道”、“王道”<sup>(7)</sup>之类背时的话，孝公一直打瞌睡，根本不听。第三次改说“霸道”，孝公方“意欲用之”。第四次卫鞅大谈“强国之术”（《史记·商君列传》），孝公越听越入神，渐渐地同卫鞅促膝并坐，连谈数日也毫无倦意。所谓“霸道”，就是通过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实现以力称霸的法治学说；所谓“强国之术”，就是弱国如何致强的一套方案。这些正投合孝公心意，于是授卫鞅以重任，放手让他实行变法改革。“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并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淮南子·要略》）。这就是孝公求贤的真正目的。

公元前三五九年至前三五〇年，秦国两次广泛地实行变法革新，商鞅吸取了山东诸国变法中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实际，使变法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措施得力，成效显著。其主要内容和收获：



一是废除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建立了以个体小农为主体的土地私有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即取消土地占有的限额，承认土地可以私有。改变了原有“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看来是家庭形式的改变，实质是推行小农个体经济。它标志着秦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二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县下设乡、里，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把全国人民编户入籍。为使居民相互监督，实行什伍连坐法，以加强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

三是推行“军功爵”制度。根据斩敌首的数目，给予赐爵、赐官、赐地（享受食邑的租税）的奖赏。这对提高秦军战斗力具有决定的意义。为使赏赐兑现，明确规定了二十等爵制<sup>(8)</sup>。“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子·定法》。无军功则任何人不得升爵。这样用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把全国上下军民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民之欲利者，非战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慎法》）。从而激发了秦民勇于战斗的狂热性。“军功爵”制为秦国造就了一代代勇猛而凶残的军功地主阶级将士，他们成为推进统一事业的坚强骨干。

四是推行以耕、战为核心的法治措施。富国强兵，是秦国上下的最大愿望和迫切需要，也是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他明确提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他以从事农战为“作壹”，使农与战互为因果，彼此促进，而以农为根本。变法的许多政策措施，都是围绕农战而制定的。为了扩大耕地，他向全国发布了二十条急农的《垦令》，还规定了一系列“劫以刑”、“驱以赏”（《商君书·慎法》）的重农政策，在全国形成了普遍注重农战的社会风气。其中最有效的一个绝招，是以优惠条

件吸引三晋百姓来秦垦荒的“徕民”政策：“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人之，利其田宅，复三代（免除徭役）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通典·食货一》）。“徕民”政策的实施，使秦国取得耕、战两利，弱敌强秦的“一箭三雕”的成果。

商鞅变法，对内加强了地主阶级专政，增强了国力；对外为谋求兼并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山东各国变法的继续和深入。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引起周天子和诸侯们的惊羨，纷纷前来向孝公庆贺。

商鞅不仅为秦国变法有功，还曾四次率军打败魏国<sup>(9)</sup>，直捣魏都安邑，活捉魏公子卬，迫使魏割地求和，恢复了河西大片土地。他将秦都从栎阳迁至“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咸阳，显示了秦国要继续东扩的宏图壮志。

在变法革新的征途上，秦虽是最后起步的，但已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使一向被人们轻视的西陲小邦，呈现出无比蓬勃兴盛的气势。西汉刘向对商鞅有高度评价：

“秦孝公保淆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新序》）。

商鞅死后，法家思想已在秦国居于统治地位，他的学说被系统整理成《商君书》，流传至今，被称为法家学说形成时期一面光辉的旗帜。

秦孝公在位二十多年的变法革新，不仅推动秦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封建社会，起了“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的创基作用；而且也促使当时各国封建化的深入发展，影响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因为“凡行于后世者，

增损厚薄，微有不同，然大抵皆鞅遗术”（叶适《学习纪言》第20卷）。所以说，孝公和商鞅是推进秦的统一和确立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人，其历史贡献是应该充分估价的。

继孝公而立的秦惠文王，对秦的统一也有很大功绩。他虽杀害了商鞅<sup>(10)</sup>，但“秦法未败”（《韩非子·定法》），仍保持了对山东各国的开放政策。接踵来秦的有墨家<sup>(11)</sup>、纵横家等谋士说客。其中对秦的统一贡献较大的，是周人司马错和魏国的纵横家张仪。

秦灭巴、蜀，是惠文王统治时的一项重大成就。战国时期的西南巴、蜀一带，不仅农业生产水平较高，丝织、盐、铁等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里是水旱从人，时无荒年，人称“天府之国”。惠文王采纳大将司马错的主张，于公元前三二六年，派他乘巴、蜀互斗之机，率军一举消灭两国。秦遂拥有秦岭以南广大地区，得以“擅巴蜀之饶”，具备了更加坚实充裕的战略基地，从而“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

“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秦灭巴、蜀后，即派张仪展开了一系列破“纵”弱楚的外交活动。张仪针对当时以魏、楚为骨干的“合纵”抗秦的形势，用软、硬两手，迫使“魏纳河西地”及“上郡十五县”（《史记·秦本纪》）。魏王背“纵”投秦<sup>(12)</sup>，打开了“合纵”的缺口，张仪也从客卿一跃而为秦国首任相国。随着“合纵”与“连横”斗争的复杂多变，张仪一度以相魏之名，行“连横”之实，再次说得魏王“乃倍（背）纵约，而因仪请成于秦”（《史记张仪·列传》）。在此前后，张仪东游齐、韩，北连燕、赵，南说荆楚，马不停蹄地为“连横”奔波于六国之间，摇唇鼓舌于侯王将相之列。“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史记·李斯列传》）。六国虽有联合攻秦之举，但因各怀鬼胎而貌合神离，往往是不成气候的一场场闹剧而已。

张仪实施“连横”策略，最为得手、最富有戏剧性的，是他自导自演的“联齐弱楚”的一幕历史滑稽剧。

经过“合纵”、“连横”之间的反复较量，三晋和燕日渐削弱，出现了秦、齐、楚三强鼎立的格局。为了分化齐、楚联盟，孤立楚国，张仪扬言给楚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诱使楚王绝齐联秦。贪图便宜的楚怀王信以为真，“遂闭关绝约于齐”。张仪回秦后，佯称“堕车”摔伤，三月不上朝。楚王以为张仪怨他“绝齐未甚”，又派勇士到宋国去“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愤然与楚绝交。及至“齐、秦之交合”，张仪竟矢口否认有“六百里”地的允诺，而向楚使诡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王怒不可遏，立即发兵攻秦。秦联齐破楚，楚军大败，损兵折将。楚王更加愤恨，复发兵击秦，又大败，只好忍辱割地。楚王对张仪恨之入骨，为擒得张仪，愿以黔中地与秦相易。谁知，大胆机智的张仪，居然主动来到楚国，与有旧交的楚国大臣靳尚合谋，通过楚王宠后郑袖，说服怀王“赦张仪，厚礼之如故”（上引《史记·张仪列传》）。

张仪对秦国的发展壮大起了巨大作用。秦国全部占有河西地带后，就可凭借黄河、函谷关等天险作屏障，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拆散齐、楚联盟，是“纵”解“横”成的重大突破；秦屡败楚军，占据了六百方里的汉中地，使秦南部领土与巴、蜀连成一片，消除了南方的威胁，沟通了南、北、东、西的交通运输，为日后东进灭楚，创造了稳操胜卷的条件。秦得巴、蜀和汉中地，“如虎添翼”。此后又接连攻楚获胜，取郢（湖北宜城西南）、郢（湖北江陵北），烧夷陵，迫使楚都一再东迁。因此说，秦能统一六国，不能轻估张仪的历史功绩。

武王继位时，秦已占有三晋一半的土地，夺得韩国西部重镇宜阳，打通了东进的门户<sup>(13)</sup>。在位仅四年的秦武王，一心向往周天子的宝座，曾扬言“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秦本纪》）。这种企图一统天下的勃勃雄心，引起东方诸侯惴惴不安。

统治秦国长达五十六年的昭襄王，在魏冉（穰侯）、范雎（应侯）两相的辅佐下，为秦的统一大业造就了成熟的条件。昭襄王执政前

期，一度联楚弱齐，后又联齐弱楚，不断向楚攻伐。楚军节节败退，楚怀王求和心切，结果被骗幽死于秦<sup>(14)</sup>。秦制服楚国后，又接连攻占韩、魏大片土地；秦军矛头已直插中原腹地。这时，原秦、齐、楚鼎立局面，已演变成秦、齐东西对峙的态势。公元前二八八年，秦、齐一度相约称“帝”，充分暴露了这两强争霸的宏图，引起了诸侯的极大不满。于是，“合纵”斗争的矛头，分别指向秦、齐大国。公元前二八七年至前二八四年，先后爆发了五国攻秦和六国伐齐<sup>(15)</sup>的大规模战争。“五国攻秦，无功而还”（《战国策·魏策二》）；六国伐齐，秦为盟主。燕将乐毅统率六国联军，杀得齐军一败涂地，国都被占，齐王出逃身亡。后虽赖田单用火牛阵幸得复国，无奈元气大伤，再也不能与秦并肩称雄，更不敢参与抗秦活动。这次攻齐大胜，实为日后秦的统一扫除了最后一大障碍。至此，山东六国无一不是秦的对手，秦军已无敌于天下。

加快秦国兼并步伐的，当数魏人范雎。他针对兼并战争出现的新形势，深感魏冉当权时的战略失策，向昭襄王献计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他还主张秦国“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战国策·秦策三》），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步步为营，把对手一个一个吞灭。他还指出穰侯依仗王母宣太后，营结裙带，大搞帮派，“御下蔽上，以成其私”的种种弊端，使昭王闻之大惧，“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sup>(16)</sup>于关外。秦王乃拜范雎为相”（《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昭襄王采用了范雎的进策，大大加速了东并的步伐，开创了战国晚期兼并战争的新局面。“远交近攻，秦卒用此术，破诸侯，并天下”（《战国策·补注》）。“远交近攻”战略方针的实施步骤是：联齐弱楚，首攻韩、魏。秦与韩、魏是近邻，“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于是，秦取得攻魏的多次胜利后，从公元前二六五年至前二六二年，连续四次攻韩

(17), 占据了韩国上党郡等大片土地。

继取得攻韩的多次胜利后, 秦于公元前二六〇年, 又发兵大举攻赵。范雎运用反间计(18), 诱使赵王以毫无实战经验的庸将赵括替代宿将廉颇。秦派白起为上将军, 在长平(山西高平县)与赵军展开决战。结果赵军惨败, 被秦坑杀四十余万人。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杀伤最多的一场恶战, 使山东最后一个强手遭到致命打击。秦军威势, 如狂飙突起, 似巨浪排空, 震撼得六国诸侯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 惶惶不可终日。

及至嬴政继位时, 秦国增扩的疆域, 计有黔中郡、巫郡、汉中郡、河东郡、陇西郡、巴郡、蜀郡、上郡、南郡、北地郡、南阳郡、太原郡、上党郡和三川郡等, 共据有中国约一半的土地。拥有带甲百万, 战车千乘, 战骑万匹的强大无敌的雄师。

纵观秦国发展壮大的历程, 正如古史权威顾颉刚先生所言: “始皇之能统一中国, 是积累穆公以来四百年的努力而成”(19)。其时名儒子顺曾预言: “当今山东六国敝而不振, 三晋割地以求和, 二周析而入秦, 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 不出三十年, 天下其尽为秦乎”(《孔丛子》)。

诚然, 春秋、战国时代, 从我国西部高原卷起的阵阵雄风, 向东越吹越猛; 它吹落了最后一顶周天子的冕旒, 吹灭了山东诸侯割据称霸的泡影, 吹熟了华夏大地上日趋统一的果实, 只等谁能有幸来摘取它。

生长在异国他邦的年幼的嬴政, 在如此一片大好的形势下, 在历史为他准备好各种优势的条件下, 在统一的果实已经熟透了的收获季节, 回到了盛况空前的秦都咸阳, 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

#### 注释:

(1) 详见 1986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秦东陵恢宏奥秘初被揭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示)一文。

(2)六世即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秦君。

(3)《史记·匈奴列传》称“八国服秦”；《李斯列传》称“并国二十”；《文选·上始皇书》谓“并国三十”；《汉书·韩安国传》作“并国十四”。《韩非子·十过篇》和《新序·善谋》皆称“益国十二”，与《史记·秦本纪》同。

(4)秦从武公起，即公元前六七八年，“初以人从死”（《史记·秦本纪》）。其后历十九位大公，未度此制，至献公时才明令加以禁止。但在始皇死后仍有多人从葬。

(5)见《秦史稿》第176页。

(6)商鞅名鞅，卫国国君后裔，故称“卫鞅”。姓公孙氏，又曰“公孙鞅”。后被秦封于“商”地，称“商鞅”，号“商君”。“商少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是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7)“帝道”，即帝王之道。“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史记·商君列传·索隐引正义》）。“王道”是指孔、孟儒家的政治主张。

(8)商鞅制定的二十等爵制，规定一至八等为民爵，无食邑；九至二十等为官爵，有食邑。二十等爵称是：①公士；②上造；③簪袅；④不更；⑤大夫；⑥官大夫；⑦公大夫；⑧公乘；⑨五大夫；⑩左庶长；⑪右庶长；⑫左更；⑬中更；⑭右更；⑮少上造；⑯大上造；⑰驷车庶长；⑱大庶长；⑲关内侯；⑳候侯。

(9)公元前三五四(孝公八年)，秦乘魏、赵交战之机，在元里大败魏军，斩首七千，攻占少梁；两年后，商鞅又乘魏、齐交战之机，率军打过黄河，安邑降；前三四〇年，商鞅再次率军攻魏，活捉公子卬；两年后，又在岸门击败魏军，俘魏将魏错。详见《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魏世家·六国年表》。

(10)孝公病危时，“欲传鞅，鞅辞不受”。孝公死后，“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史记·商君列传》）。另据《战国策·秦策一》载：公子虔之徒“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讎仇也，愿大王图之。”后鞅被捕，车裂以徇。商鞅是权力争夺的受害者。

(11)《十批判书》称：“墨家钜子腹䵍是惠王的先生，墨者唐姑果是惠王的亲信，在他的一代先后有墨者集中于秦”（见该书第367页）。

(12)《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魏邑），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



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

(13)秦惠王时，曾一度攻克宜阳，后又为韩夺回（《史记·六国表·韩世家》）。宜阳是秦、韩接壤的最大城邑，是秦东并必经之门户。它既关系韩国的存亡，又构成对山东各国的威胁。

(14)《史记·楚世家》载：秦昭王八年，致书约楚怀王到秦武关结盟修好。“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后怀王逃奔赵国，赵不纳，又被秦捉回，于昭襄王十一年死于秦。

(15)也有称“五国伐齐”。《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无楚。另据《史记·楚世家·田齐世家》均有楚，故称“六国伐齐”。攻秦的五国，据《战国纵横家》是韩、赵、魏、燕、齐五国。

(16)穰侯魏冉是宣太后的弟弟。高陵君、泾阳君皆昭襄王的同母弟。华阳君是宣太后的同父弟（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索隐》）。

(17)据《史记·韩世家》及云梦秦简《编年纪》载：公元前二六五年，秦攻取韩少曲（河南孟县）、高平（河南济源西南）。次年，白起攻韩陔城（山西曲沃北），拔五城，斩首五万。前二六三年，白起又攻韩南阳。又次年，秦又攻取韩野王（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郡守逃至赵。

(18)《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称：“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马服君赵奢之子，时赵奢已死）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

(19)参见顾颉刚撰《秦始皇》，载《人文杂志》第1卷第2期。